

欧美国家移民问题政治化： 背景、争议问题及政治竞争逻辑

孙 涵

[内容提要] 21 世纪以来,欧美国家移民问题政治化趋势加强。这与二战后的全球化进程、欧美国家在 20 世纪 70 年代对移民政策的调整以及右翼民粹主义力量的崛起密切相关。与此同时,欧美社会围绕移民的经济和文化问题也出现激烈争议,争议的过程显示出不同群体对移民问题的两种不同的诠释。在政治竞争逻辑下,移民问题政治化突出表现为左右翼主流政党鲜明的身份政治化趋势,这既是它们在社会文化价值观上对立的产物,也是其为了迎合特定选民群体、特定党内派系对移民问题的政治诉求的结果。由此也导致左右翼主流政党忽视了本党其他选民基础、其他党内派系在移民问题上的不同诉求,有鉴于此,两者对各自的选举战略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关键词] 欧美国家 移民问题政治化 主流政党 右翼民粹主义

DOI:10.16502/j.cnki.11-3404/d.2023.01.003

移民^①问题政治化是指移民问题本身在更大程度上作为一个政治问题被提出,同时,移民问题与政党政治的联系日趋紧密。这种政治趋势在近些年的欧美国家显得尤为突出,特别体现在选举政治中。在美国,特朗普高举反移民旗帜使其在 2016 年大选中脱颖而出,并在四年任期内对美国移民政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英国,普通民众对移民问题的担忧成为“脱欧”公投的关键动因,主张“脱欧”的鲍里斯·约翰逊也在 2019 年的英国大选中战胜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在 2022 年法国大选中,一向突出反移民立场的国民联盟党主席玛丽娜·勒庞在此次选举中也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鉴于移民问题近些年在欧美国

家政治议程中的突出位置,本文拟从背景、核心争议问题、主流政党在移民问题上的突出表现三个视角分析欧美国家移民问题政治化。

一、移民问题政治化的背景

欧美国家移民问题政治化主要与以下三个政治进程密切相关。总体来说,这三个政治进程导致欧美国家的移民数量攀升、种族多样性增强以及反移民情绪的政治泛滥。

^① 欧美国家在“移民”一词上有两种表述。一种是 migration,一般指国内的人口流动;另一种是 immigration,一般指人口的跨国流动。本文关于欧美国家移民问题的研究是关于人口的跨国流动。

第一 二战后的全球化进程导致移民集中在欧美发达国家。美国学者查尔斯·蒂利认为,世界已经经历了三波全球化浪潮,分别发生在1500年、1850—1914年和二战后。^①虽然移民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但二战后的全球化进程却深刻改变了跨国人口流动的地理方向,体现为移民多集中在欧美发达国家。这种现象的产生与二战后的去殖民化运动以及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密切相关。历史上,欧洲人曾通过殖民等方式迁移到美洲、亚洲和非洲等地,但这种移民模式却在二战后发生改变。去殖民化运动导致大规模欧洲殖民者从殖民地返回欧洲各国;同时,欧洲在殖民过程中也无意地建立了从前殖民地到欧洲的移民路径。这使许多前殖民地的人口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出于劳工招聘或者其他理由自发地前往欧洲。欧洲众多国家也从此前的殖民国转变为移民目的国,“1956年,西德雇佣了9.5万名外籍工人,到1966年,这一数字增至130万”^②。美国也是如此,虽然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以及随后的二战使美国移民的数量严重下跌,但二战后美国经济的繁荣发展迫切需要移民劳工,再加上亚洲、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去殖民化,导致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等地的移民涌入美国。而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经济发展格局则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90年代,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进程鼓励资本、商品和人员的跨国界流动,也由此在欧美国家形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格局。1993年生效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鼓励欧盟内部的人口流动,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则造成大量墨西哥移民前往美国。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移民多是由不发达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流向欧美发达国家。《2020年世界移民报告》显示,2019年的世界前十大移民目的国中有六个欧美国家,分别是美、德、俄、英、法、意。^③

第二 20世纪70年代欧美国家对移民政策的调整增加了人口的种族多样性。70年代的石油危机推动了欧洲经济结构调整,减少了欧洲的劳动力需求。因此,欧洲国家相继出台了限制性移民政策,以缩减外国劳工的数量。瑞士、瑞典、德国、法国分别于1970、1972、1973和1974年实施限制性移民政策。^④但是,旨在控制移民数量

的政策反而造成非欧洲移民人数显著增加,原因在于非欧洲移民在劳工招聘的限制下,不再临时居住在欧洲国家,而是开始永久定居,随后其家人和朋友也相继来到欧洲。尽管政府起初试图限制家庭移民,但收效甚微。^⑤非欧洲移民的大量涌入导致欧洲国家的种族多样性增加。曼彻斯特大学2012年的报告显示,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的非白人人口数量在1991、2001和2011年分别占总人口的7%、9%和14%。^⑥美国对移民政策的调整要早于欧洲,1965年的《移民与国籍法》取消了长期有利于欧洲移民的国籍配额制度,转向强调家庭团聚和熟练工人的移民政策。这使来自非欧洲国家的移民大量涌入美国,从而增加了少数族裔人口的数量。皮尤研究中心预测,1965—2065年,西班牙裔占比将从4%上升到18%,亚裔占比将从不到1%上升到6%。^⑦由于种族多样性的增加,欧美国家的白人在不久的将来很有可能会成为少数族裔。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大卫·科尔曼的研究认为,英国白人将会在2070年左右成为少数族裔。^⑧德国数据统计机构 Statista 的人口数

- ① Charles Tilly et al., *Social Movements (1768 - 2018)*, New York: Routledge, 2020, pp. 103 - 106.
- ② [美]约翰·朱迪斯《民粹主义大爆炸》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110页。
- ③ IOM,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20*,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p. 26.
- ④ Blanca Garcés - Mascareñas and Rinus Penninx, *Integration Processes and Policies in Europe: Contexts, Levels and Actors*, Springer, 2016, p. 35.
- ⑤ 1961年《欧洲社会宪章》第19条规定,移民工人的家庭团聚是一项基本权利。尽管某些政府也试图限制家庭移民,但是效果不明显。
- ⑥ Stephen Jivraj, “How Has Ethnic Diversity Grown 1991 - 2001 - 2011?”, chrome - extension: //ikhdkkncnoglhljlkmcimlnhkeamad/pdf - viewer/web/viewer.html? file = http% 3A% 2F% 2Fhummedia. manchester. ac. uk% 2Finstutes% 2Fcode% 2Fbriefings% 2Fdynamicsofdiversity% 2Fhow - has - ethnic - diversity - grown - 1991 - 2001 - 2011. pdf.
- ⑦ “Modern Immigration Wave Brings 59 Million to U. S., Driving Population Growth and Change Through 2065”, <https://www.pewresearch.org/hispanic/2015/09/28/modern-immigration-wave-brings-59-million-to-u-s-driving-population-growth-and-change-through-2065/>.
- ⑧ “White Britons ‘Will Be Minority’ Before 2070, Says Professor”,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uk/home-news/white-britons-will-be-minority-before-2070-says-professor-8600262.html>.

据预测,美国非西班牙裔白人在2060年将占总人口的44.29%。^①

第三,右翼民粹主义力量的崛起强化了移民问题的政治化趋势。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右翼民粹主义政治思想的蔓延成为欧美国家的一个普遍现象。在欧洲众多国家,它直接体现为一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各国选举中崛起;而在美国,它主要体现为民粹主义力量对主流政党尤其是共和党的渗透,如特朗普所代表的建制派政治力量。美国政治分析家约翰·朱迪斯认为,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最直接的原因是它们倾听了民众对非欧洲移民及难民的不满”^②。而这与欧美国家经济与文化格局的变化密切相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欧美国家经济不平等问题凸显、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回潮、逆全球化趋势明显增强。以白人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反移民者陷入经济不满与文化焦虑的绝望情绪中,他们指责移民抢占工作、压低工资、侵犯了西方主流价值观。特别是大多数欧美国家政府在移民问题上应对无力,导致移民危机持续升级,更进一步降低了白人工人阶级对移民的容忍度,也为右翼民粹主义力量的蔓延提供了契机。一些研究者强调“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动员方式,其显著特征是诉诸人们的危机意识。”^③本杰明·莫菲特进一步指出,民粹主义与危机意识也是在彼此塑造,“危机往往是对一系列现象的松散描述……危机不仅触发了民粹主义,而民粹主义也一直在催化危机,危机是民粹主义的内在核心特征”^④。英国“脱欧”派赢得英国“脱欧”公投的胜利以及特朗普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缘于两者充分调动了选民对移民的不满情绪与忧患意识。本地人对移民的不满往往是因为其感受到^⑤了移民的威胁。群体威胁理论(group threat theory)认为,本地人通常将移民视为资源竞争(包括物质层面的竞争和非物质层面的竞争)的对象,这种资源竞争关系会使本地人产生被移民威胁的感觉,“竞争滋生威胁的意义在于,一个群体的收益被认为是另一个群体的损失”^⑥。右翼民粹主义力量通过有意识地强调移民带来的威胁而进一步强化了白人工人阶级的反移民情绪。

二、移民问题政治化中的核心争议:两种不同的诠释

伴随移民问题政治化进程的是欧美社会围绕移民问题的争议。关于移民问题的核心争议主要涉及移民对欧美国家的就业与工资、税收与福利以及文化同化等问题的影响。争议中,移民问题作为一种社会进程本身,明显呈现出两张不同的面孔。一张面孔更多呈现出移民所带来的良性影响,而另一张面孔则更多呈现出移民的消极意义,尤其是移民给本地人带来的实质性经济损失与所谓的文化威胁。对移民问题的两种不同诠释,既显示出移民问题对欧美社会多重影响的事实,也显示出不同政治力量在移民问题上借用特定话语,有意识地利用和夸大移民问题中某一个或某些特定方面的事实。

(一) 移民对就业和工资的影响

1. 移民对本地人就业的影响

像特朗普这样的反移民者声称,移民抢占了本地人的制造业工作。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经合组织”)2014年的报告显示,新移民在美、欧缺乏行业前景的职业中占比分别约是28%和24%。^⑦这项研究结果是否支持移民抢占本地人工作这一观点还有待商榷,但事实却是,欧

① “Percentage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2016 and 2060, by Race and Hispanic Origin”,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70272/percentage-of-us-population-by-ethnicities/>.

② [美]约翰·朱迪斯《民粹主义大爆炸》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114页。

③ 林德山《欧美民粹主义盛行的根源、影响及应对》,载于《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年第17期。

④ Benjamin Moffitt, “How to Perform Crisis,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in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 50, No. 2, 2015, pp. 189–217.

⑤ 感受到的威胁是强调本地人的主观感受而不是客观事实。移民是否对本地人造成真实的威胁有待讨论(本文第二部分详细阐述了围绕移民问题的经济与文化争议)。

⑥ Andrea Bohman, “Anti-immigrant Attitudes in Context: The Role of Rhetoric, Religion and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https://www.diva-portal.org/smash/get/diva2:714517/FULLTEXT03.pdf>.

⑦ OECD, “Is Migration Good for the Economy?”, <chrome-extension://ikhdcknenoglgghjlkmcimlnlhkeamad/pdf-viewer/web/viewer.html?file=https%3A%2F%2Fwww.oecd.org%2Fmigration%2FOECD%2520Migration%2520Policy%2520Debates%2520Numero%25202.pdf>.

美国国家的确有一定数量的移民从事着制造业这类工作。尤其是,近些年欧美制造业岗位缩减严重,这意味着移民和本地人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会更加激烈,移民抢占本地人工作的可能性也越大。欧美国家制造业岗位缩减已经成为一种经济趋势。相关数据表明,2005—2010年,美国失去了240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①而英国在1966年有890万人从事制造业工作,到2019年这一数字下降到270万人。^②

支持者则认为移民与本地人往往从事的是不同类型的工作,移民包括非法移民并没有抢占本地人的工作。研究表明,低技能移民通常从事的是“3D”工作,即肮脏的(dirty)、危险的(dangerous)和不体面的(demeaning)的工作,^③这些工作都是本地人不愿从事的。美国移民委员会在2013年的报告中指出,就算移民和本地人在同一行业也是各有分工,通常两者在就业上是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竞争。^④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万达·费尔巴·布朗也指出,移民对大多数本地工人的总体就业水平没有显著影响。^⑤无证移民^⑥通常从事的是本地工人不愿意做的“令人不快的、繁重的工作”^⑦,如海鲜加工、酒店服务等行业的工作。一项针对27个欧洲国家(2000—2017年)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移民对本地人失业并没有显著影响。^⑧相反,因为移民多是适龄工作人口,反而减轻了欧美国家劳动力短缺的压力。皮尤研究中心指出,预计移民及其子女在2015—2035年将为中国增加约1800万适龄工作人口。^⑨

2. 移民对本地人工资的影响

反对者认为,移民压低了本地人的工资。原因在于,移民工人扩充了产业后备军的队伍,将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范围辐射到全球,进而加剧了本地人与移民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一般认为,劳动力供给数量增加会降低劳动力的相对价格,再加上工会对工人保护力度减弱,雇主就会进一步压低本地工人的工资。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乔治·博尔哈斯被学术界称为“主要的移民怀疑论者”,他认为移民确实伤害了美国本地人尤其是低技能工人,但企业主却明显从中获益。其研究结果显示:在一个七万亿美元的经济体中,若移民占美国总人口不到10%,那么移民给本地工人造成的损失预计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9%(大

约为1330亿美元),雇主间接从移民中获得的利益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大约为1400亿美元)移民带来的净收益大约是70亿美元。而移民造成的1330亿美元的损失并没有凭空消失,移民的雇主以及购买移民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从中受益。^⑩

支持者认为移民对本地人工资的影响很小。因为工资并不是一个给定的分配数量,它是由生产力决定的,一方工资的下降并不会以另一方工

① [美]厄尔·怀松等《新阶级社会:美国梦的终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43页。

② Christina Beatty and Steve Fothergill, “The Long Shadow of Job Loss: Britain’s Older Industrial Towns in the 21st Century”,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022818/>.

③ Nasra M. Shah, *The Management of Irregular Migration and Its Consequence for Development: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09, p. 19.

④ American Immigration Council, “The Economic Blame Game: Immigration and Unemployment”, <https://www.americanimmigrationcouncil.org/research/economic-blame-game-immigration-and-unemployment>.

⑤ Vanda Felbab Brown, “The Wall”, <https://www.brookings.edu/essay/the-wall-the-real-costs-of-a-barrier-between-the-united-states-and-mexico/>.

⑥ 欧美社会关于未经官方授权就进入或者居住在欧美国家的移民通常有三种不同的称谓,即非法移民(illegal immigrant)、无证移民(undocumented immigrant)和未经授权的移民(unauthorized immigrant)。相关研究指出:反移民的保守派更倾向于使用“非法移民”一词,以此强调移民的违法行为;亲移民的自由派倾向于使用“无证移民”一词;而“未经授权的移民”相对来说是一个价值中立的表述,但这也并非绝对。可参见 Jonathan Kwan, “Words Matter: Illegal Immigrant, Undocumented Immigrant, or Unauthorized Immigrant?”, <https://www.scu.edu/ethics/focus-areas/immigration-ethics/immigration-ethics-resources/immigration-ethics-blog/words-matter-illegal-immigrant-undocumented-immigrant-or-unauthorized-immigrant/>.

⑦ Vanda Felbab Brown, “The Wall”, <https://www.brookings.edu/essay/the-wall-the-real-costs-of-a-barrier-between-the-united-states-and-mexico/>.

⑧ Bekir Gündoğmuş and Musa Bayir, “The Effect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n Unemployment: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European Countries”, in *MANAS Sosyal Araştırmalar Dergisi*, Vol. 10, 2021, p. 2204.

⑨ Abby Budiman, “Key Findings About U. S. Immigrants”,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20/08/20/key-findings-about-u-s-immigrants/>.

⑩ George J. Borjas, “The New Economics of Immigration”, in *The Atlantic*,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1996/11/the-new-economics-of-immigration/376705/>.

资的提高来达到平衡。布朗的上述研究也认为,“移民劳工对本地工人的工资影响很小”^①。而且,低技能移民不仅不会压低本地人的工资,反而会推动本地人从事技能更高、工资更高的工作。2010年的一项有关移民对各国经济影响的研究指出,移民增加了西欧国家居民的工资。^②美国经济学家、加利福尼亚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全球移民中心主任乔瓦尼·佩里在其研究中计算了1990—2004年美国移民对本地人工资的影响。其研究表明,移民对教育程度低的工人造成了损失,但提高了教育程度高的工人的收益,最终移民使本地工人的平均工资增加了大约1.8%。^③

(二) 移民对税收和福利的影响。

1. 移民对税收的影响

反对者认为,移民不纳税或者纳税的额度要低于其所享受的福利,他们担心移民拿走的比带来的要多。白人中产阶级中的激进派通常支持这一观点,他们认为政府向自己征收高额税用来补贴穷人、移民与非法移民。“你没资格花我赚的钱”^④体现了中产阶级对移民的愤怒。特别是近几年欧美国家的税收改革明显向上层阶级倾斜,这也导致美国许多中产阶级的税率要高于福布斯前400名富豪的税率^⑤从而强化了白人中产阶级对移民的排斥。特朗普在2017年签署《减税和就业法案》时一再强调,此次减税将会使中产阶级受益。但研究表明,这次减税还是使超级富豪受益,“2018年美国前0.1%的亿万富翁的平均有效税率是23%,而最底层的50%家庭的所得税税率则是24.2%”^⑥。

支持者认为,移民也需要缴纳消费税、房地产税、汽油税等。美国的移民包括无证移民每年要向联邦、州和地方缴纳数十亿美元的税款。扎卡里·米勒在其文章中指出,美国的移民在2017年缴纳的税款为4054亿美元,其中无证移民缴纳的税款约为272亿美元。^⑦而且,经合组织在其报告中指出,大多数国家中移民的税收与社会贡献大于他们享受的个人福利。^⑧针对2006—2018年22个欧洲的经合组织成员国以及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研究表明,移民的税收和缴款都高于政府对其在福利方面的支出。^⑨

2. 移民对福利的影响。

反对者认为,移民给欧美国家造成了福利负

担。经合组织的数据表明,美国1980年的公共社会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9%,而2019年则上升到18.7%。同时,美国接受食品、教育等方面的受助者数量也明显上升。^⑩针对这种情况,反对者往往强调是移民导致福利支出和受助者人数居高不下,而且移民的福利参与率往往高于本地人。乔治·博尔哈斯的研究表明,1990年美国移民家庭和本地家庭的福利参与率分别是9.1%和7.4%。^⑪史蒂文·卡马罗塔的研究指出,2005年美国大约有29%的移民家庭和18%的本地家庭至少使用一项福利计划。^⑫

但支持者并不认同移民给欧美国家造成福利

- ① Vanda Felbab Brown, “The Wall”, <https://www.brookings.edu/essay/the-wall-the-real-costs-of-a-barrier-between-the-united-states-and-mexico/>.
- ② Frederic Docquier, Çağlar Ozden and Giovanni Peri, “The Wage Effects of Immigration and Emigration”, in *Discussion Paper*, Vol. 1, 2010.
- ③ Giovanni Peri, “America’s Stake in Immigration: Why Almost Everybody Wins”, in *The Milken Institute Review*, Third Quarter, 2007, p. 8.
- ④ [美]约翰·朱迪斯《民粹主义大爆炸》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55页。
- ⑤ Seth Hanlon and Nick Buffie, “The Forbes 400 pay lower tax rates than many ordinary Americans”, <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article/forbes-400-pay-lower-tax-rates-many-ordinary-americans/#:~:text=According%20to%20the%20Tax%20Policy%20of%20the%20excise%20taxes.>
- ⑥ Cynthia Measom, “Billionaires vs. the Middle Class Across America: Who Pays More in Taxes?”, <https://finance.yahoo.com/news/billionaires-vs-middle-class-across-120041227.html#:~:text=According%20to%20their%20research%20they,of%202024.2%25%20toward%20income%20tax.>
- ⑦ Zachary Mueller, “Immigration 101: Do Immigrants Pay Taxes?”, <https://americasvoice.org/blog/immigration-101-immigrant-taxes/#:~:text=The%20basic%20answer%3A%20yes.%20taxes%20paid%20by%20undocumented%20immigrants.>
- ⑧ OECD, “Is Migration Good for The Economy?”, in *Migration Policy Debates*, 2014, p. 2.
- ⑨ Ana Damas de Matos, “The Fiscal Impact of Immigration in OECD Countries Since The Mid-2000s”, <https://www.oecd-ilibrary.org/sites/4ccb6899-en/index.html?itemId=/content/component/4ccb6899-en>.
- ⑩ 参见经合组织国家数据库 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SOCX_AGG.
- ⑪ George J. Borjas, “The Economic Benefits from Immigration”, in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9, No. 2, 1995, p. 4.
- ⑫ Steven A. Camarota, “Immigrants at Mid-decade”, <https://cis.org/sites/cis.org/files/articles/2005/back1405.pdf>.

负担的观点,并从两方面予以论证。一方面,欧美国家的福利政策一般都偏向老年人和本地穷人,而移民多是年轻人,所以移民经常享受不到福利或是只享受了低度福利。卡托研究所的报告表明,2016年,美国联邦政府的福利国家支出约为2.3万亿美元,其中1.5万亿美元预期受益者是老年人,另外8000亿美元的预期受益者是穷人。^①移民并未在美国福利政策的受益者之列。而且,相关研究认为,由于美国达到经济贫困和年龄限制这些资格门槛的移民使用福利政策的比率较低,所以就算移民享受福利,花费的资金通常也少于本地人。^②此外,一般法律也将非法移民排除在福利政策之外,例如,1993年的法国帕斯夸法(Pasqua Laws of 1993)、1994年的美国加州187号提案、1996年的美国福利法都拒绝非法移民享受福利。^③另一方面,移民也不会增加福利预算。卡托研究所的研究显示“历史上,美国的移民及其后代没有增加福利预算规模,未来也不太可能。”^④2013年,美国社会保障局首席精算师史蒂芬·戈斯表示,未经授权的移民的收入总体上会对社会保障的财务状况产生净积极影响。^⑤

(三) 关于移民同化问题的争论

移民文化是否会冲击欧美国家的核心文化涉及同化问题,这也是关于移民文化争论的重要问题。“同化”(assimilation)或称“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并不是指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或血缘融合,而是指不同文化的相互渗透。在文化同化过程中,不同文化的对抗性会逐渐消失。在美国,人们更喜欢用“同化”一词,而在欧洲,人们更倾向于“融合”(integration)一词。

反对者认为非欧洲移民同化程度较低,甚至不愿意被同化,所以移民文化对欧美国家的核心文化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例如,美国白人更欢迎来自北欧和西欧的移民,并视他们为优等种族。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白人往往排斥来自非欧洲地区的移民,并将其视为劣等种族与文化他者(cultural other)。部分原因在于欧洲移民更愿意也更容易接受以盎格鲁—撒克逊为核心的美国价值观与同化政策,而非欧洲移民是不情愿融入本地主流文化和社会中的。反对者指责非欧洲移民居住在移民社区、避免异族通婚、使用民族语

言、与母国保持密切联系并疏远本地人,在主流社会之外建立了一个平行社会(parallel society)。由此反对者认为,随着非欧洲移民的大量涌入,移民文化会破坏欧美文化的同质性。例如,亚洲移民的涌入使佛教徒数量上升,伊斯兰教随着穆斯林移民的增加也快速发展起来,佛教和伊斯兰教逐渐在美国占有一席之地。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基督教徒认为自己遭受了宗教歧视,^⑥而这与移民联系密切。与之相伴,美国基督教徒的数量也在缩减。皮尤研究中心将2018和2019年的美国宗教调查数据与十年前的数据进行了比对,结果显示,在这十年里,美国成年人中基督徒的比例下降了12%,无神论者却增加了9%,^⑦而移民更有可能是无神论者^⑧。

- ① Alex Nowrasteh and Robert Orr, “Immigration and the Welfare State: Immigrant and Native Use Rates and Benefit Levels for Means - Tested Welfare and Entitlement Programs”, <https://www.cato.org/immigration-research-policy-brief/immigration-welfare-state-immigrant-native-use-rates-benefit>.
- ② Alex Nowrasteh and Robert Orr, “Immigration and the Welfare State: Immigrant and Native Use Rates and Benefit Levels for Means - Tested Welfare and Entitlement Programs”, <https://www.cato.org/immigration-research-policy-brief/immigration-welfare-state-immigrant-native-use-rates-benefit#>.
- ③ Ayse Ceyhan and Anastassia Tsoukala, “The Securitization of Migration in Western Societies: Ambivalent Discourses and Policies”, in *Alternatives*, Vol. 27, No. 1, 2002, pp. 34 - 35.
- ④ Alex Nowrasteh and Zachary Gochenour, “No, Immigrants Won't Make Welfare State Bigger”, <https://www.cato.org/commentary/no-immigrants-wont-make-welfare-state-bigger>.
- ⑤ Zachary Mueller, “Immigration 101: Do Immigrants Pay Taxes?”, <https://americasvoice.org/blog/immigration-101-immigrant-taxes/#:~:text=The%20basic%20answer%3A%20yes.%20taxes%20paid%20by%20undocumented%20immigrants>.
- ⑥ Emma Green, “Most American Christians Believe They're Victims of Discrimination”, <https://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16/06/the-christians-who-believe-theyre-being-persecuted-in-america/488468/>.
- ⑦ Pew Research Center, “In U. S., Decline of Christianity Continues at Rapid Pace”,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19/10/17/in-u-s-decline-of-christianity-continues-at-rapid-pace/>.
- ⑧ Caryle Murphy, “Growing share of U. S. Immigrants Have No Religious Affiliation”,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5/05/19/growing-share-of-u-s-immigrants-have-no-religious-affiliation/#:~:text=For%20example%2C%20among%20immigrants%20who,unaffiliated%20and%2063%25%20are%20Christian>.

支持者则认为,以白人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反移民者对非欧洲国家的移民文化心存偏见,移民的同化程度并没有下降,反而有所提高。2015年美国国家科学研究院的研究指出“目前的移民及其后代正在融入美国社会。随着移民在美国的时间越长,他们越来越像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也越来越像美国本地人,而不是像他们的父母。”^①熟练掌握英语已经成为同化的一项重要标志。美国学者雅各布·维格多通过对1900—2000年相关信息的实证分析得出结论:“相比一个世纪前的移民,如今的移民更加精通英语,只是学习英语的速度变慢了。”^②有学者从经验出发,认为移民完全同化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两代人甚至三代人去完成,^③这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

三、主流政党助推移民问题政治化

移民问题是右翼民粹主义的主要政治话题,因此,人们也更强调右翼民粹主义力量的崛起对移民政治化的影响。事实上,移民问题政治化并不只是右翼民粹主义力量兴起的结果,更是左右翼主流政党在移民问题上相互竞争造成的。左右翼主流政党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一些趋势性变化导致两者在移民问题上的身份政治化趋向,而两者在政治竞争中为了刻意迎合特定选民、特定党内派系对移民问题的政治诉求,更会有意识地放大移民或好或坏的一方面。由此造成主流政党忽视了该党其他选民基础、其他党内派系对移民问题的不同看法等问题。而上述主流政党的这些政治表现都在不同方面共同驱动了移民问题政治化。

(一) 主流政党在移民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

20世纪80年代以来,左右翼主流政党在政治议程上的一些趋势性变化,加剧了两者在众多社会问题包括移民问题上的分化趋向,这也是移民问题政治化的重要政治动因。一方面,两者在经济政策上放弃了二战后盛行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模式,转而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以及基于新自由主义的市场逻辑所推行的全球化政策驱动了新一轮移民潮。另一方面,两者在社会文化政策上却呈现出明显的分化趋势。左翼日益突出激进自由主义,尤其是多

元文化主义的价值观念,因而在移民政策中强调对移民的保护;与之相对,右翼则强调其保守主义的思想观念,因此强调对本地人的保护并支持严格的移民政策。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凯恩斯主义政策模式失灵并受到普遍怀疑的背景下,左右翼主流政党逐渐在经济政策上达成了新的共识,即接受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改革。这一改革最初是由玛格丽特·撒切尔领导的英国保守党政府与罗纳德·里根领导的美国共和党政府推进的。在迎合全球化的旗帜下,市场改革之风在欧美国家蔓延,中左翼政党在20世纪90年代所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就是其突出表现。以比尔·克林顿为代表的美国新民主党人、以托尼·布莱尔为代表的英国“新工党”以及以格哈德·施罗德为代表的德国社民党“新中间”派,虽均标榜自己代表了不同于传统老左派和新右派的“第三条道路”,但其政策方式,尤其是经济政策更凸显了对市场原则的运用。由此,人们认为“第三条道路”在实践中表现出了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妥协,进而左右翼主流政党在经济政策上形成了一种基于新自由主义的共识。

本质上,新自由主义的市场逻辑及其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鼓励劳动力人口的跨国流动,其政策主张者也更倾向于以积极的态度看待移民,表现出对移民尤其是高技能移民的欢迎。里根曾就移民问题表示“我们的国家是一个移民国家。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的力量来自移民遗产以及我们对移民的欢迎。”^④此外,左右翼主流政党基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共识更是体现在为了迎合全球化进程所做出的一系列重大制度创新上,包括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及欧盟东扩

① Panel on the Integration of Immigrants into American Society, *The Integration of Immigrants into American Society*, Washington: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15, p. 3.

② Jacob L. Vigdor, *From Immigrants to Americans: The Rise and Fall of Fitting In*, Washington, DC: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9, p. 79.

③ Alvaro Vargas Llosa, *Global Crossings: Immigration, Civilization, and America*, Independent Institute, 2013.

④ “Reagan’s Statement On Immigration”, <https://www.nytimes.com/1981/07/31/us/reagan-s-statement-on-immigration.html>.

等。其中一些制度构建的核心逻辑就是基于新自由主义的原则,这也在客观上推动了新一轮移民潮。一些学者更是直言新一轮移民潮是受资本积累的需要驱动的,美国学者丹尼斯·坎特伯雷强调“新自由资本主义对劳动力迁移的目标只有一个,即剥削劳动力并通过以帝国主义为中心的资本积累模式来积累利润”^①。

与上述左右翼主流政党达成经济共识相反的是两者在社会文化观念上的背离性趋势,而这根植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美社会两种对立的价值观。一种是进步主义阵营中的激进自由主义,这种价值取向因为6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和欧洲新社会运动而被强化,它们突出激进的多元文化主义价值观,强调对少数族裔或社群的社会文化权利的保护。另一种是保守主义阵营中的新保守主义价值取向,它试图抵制上述激进自由主义,认为少数族裔或社群的权利自由化威胁到了既有的社会文化秩序,因而更强调回归传统的社会观念,包括家庭、宗教和民族主义。

这两种价值取向都体现在了左右翼主流政党与移民有关的社会问题的立场中。美国民主党在20世纪60年代后日益突出激进自由主义的价值观,表现出对移民权利的支持与保护。而二战后的欧洲社民党则通过重塑民主社会主义价值观,并将其与激进自由主义进一步融合,日益突出民主的价值观念。^②60年代后,社会民主党在价值观念上进一步迎合了激进自由主义的观点,日益强调更为彻底的个人自由和多元主义。在移民问题上,欧洲社会民主党人也与美国民主党人一样,更为强调对移民权利的支持和对移民文化的包容。但这种激进自由主义引起了右翼阵营中新保守主义者的不满,后者认为,这种激进自由主义浪潮使自由主义持续左倾并愈发极端,摧毁了其所珍视的传统主流价值观与稳定的社会秩序。因此,新保守主义者决心复兴传统的主流价值观,他们日益表现出对基督教和家庭价值观的重视,也表现出对移民多元文化主义的反对,强调对本地人的保护并突出移民的文化威胁。

如上所述,20世纪80年代后左右翼主流政党在经济问题上达成了新自由主义的共识,但在社会文化观念上却呈现出日趋明显的背离趋势。这种反差打破了欧美主流政党曾在二战后一度出

现的政治共识,并在移民政策上显示出日趋明显的对立立场。整体来看,中右翼政党多主张限制性移民政策,中左翼政党则多支持宽容的移民政策。但德国联盟党的移民立场则较为特殊,由于受基督教博爱思想的影响,该党对移民带有一种天然的宽容与善意。^③

(二) 主流政党在移民问题上的身份政治化趋势

身份政治是具有特定种族、民族或宗教信仰的群体对自身特定利益的追求。使用不同语言、具有不同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的移民大量涌入欧美国家,引发了白人团体新一轮的身份危机。在美国,移民所引发的身份危机主要表现为族裔差异,即民主党主导的少数族裔身份政治与共和党主导的白人身份政治在移民问题上相互对抗。这在欧洲则主要体现为欧洲身份与国家身份的对抗。

身份政治的产生既是左右翼主流政党在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上彼此对立的结果,更是两者在欧美产业结构变化及其所引发的社会阶级结构与价值观念的转变这一时代背景下、为了迎合特定选民群体的政治诉求所进行政党路线调整的产物。

20世纪70年代后,欧美国家步入后工业社会,同时产业结构重心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80年代的扩张,更是强化了欧美国家内部的去工业化趋势。与之相伴,产业工人队伍日益萎缩而新中产阶级队伍日趋庞大,两者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导致他们在价值观

^① Dennis C. Canterbury,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Migration*, Boston: Brill, 2012, pp. 73-74.

^② 20世纪60年代,欧美国家激进自由主义高涨,日趋庞大的新中间阶级是该思潮的主导力量。这一时期的欧洲社会民主党在政治战略上普遍转向一种跨阶级联盟战略,其核心在于实现新中间阶级与传统工人阶级的联盟。为此,社会民主党在淡化其传统的阶级政治色彩的同时,也有意识地迎合上述激进自由主义观念,积极拥抱多元文化主义。欧洲社民党转型问题参见林德山《世纪的沉浮:欧洲社会民主党思想政治演变的逻辑与问题》,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年第6期。

^③ 但在默克尔担任总理期间,联盟党的移民政策摇摆不定。在政治言辞上,基民盟对移民更为包容,而基社盟更支持限制性移民立场。参见 Leila Hadj Abdou, Tim Bale and Andrew Peter Geddes, “Centre-right Parties and Immigration in an Era of Politicisation”, in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Vol. 48, No. 2, 2022, p. 337.

上的明显分化,而这种价值观上的分歧也塑造了各自对移民问题的不同认知。新中产阶级在收入、教育或职业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多具有进步、自由的世界主义价值观,倾向于认同移民的积极面孔,因而支持宽容的移民政策或是表现为对欧洲身份的强调;而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工人阶级是全球化进程中的落后者,他们倾向于将自己与所属群体的落后状态归咎于移民,看到更多的是移民的消极面孔,因而支持限制性移民政策或是表现为对国家身份的渴望。

基于上述社会背景,中左翼主流政党调整了其政治战略,将主要重心转向了新中间阶级,为此日益淡化自己传统的阶级政治身份,转而以“去阶级”的身份政治来赢得新中产阶级选民的支持。美国民主党的少数族裔身份政治以多元文化主义思想为支撑、支持移民的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突出移民的积极一面,也因此赢得了新中产阶级选民的拥护。

在美国民主党构建少数族裔身份政治的同时,美国共和党主导的白人身份政治也逐渐发展起来,并形成了一股强大的保守主义政治力量。顾名思义,白人身份政治是凸显欧美本地白人,尤其是欧洲裔本地白人的身份诉求。白人所产生的经济焦虑、文化失落^①以及对自身种族优势地位^②的担忧与移民密切相关,这些问题共同塑造了该群体的集体意识,也推动了白人身份政治的产生。首先,经济不平等推动白人对移民经济价值产生负面看法。美国所实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造成了经济增长与贫富差距相伴而生,而经济处境不断恶化的白人工人阶级往往指出移民对经济的负面作用。201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有61%的白人工人阶级认为移民抢占工作、住房和医疗保健。^③其次,少数族裔身份政治激化了白人对移民多元文化主义的反对。民主党所推行的一系列多元文化政策旨在纠正法律和政策上对移民等少数群体的歧视。但在白人看来,多元文化政策在美国形成了一股反白人、反主流的情绪,自己反倒成为多元文化政策的牺牲者。威尔·金里卡指出,人们反对移民多元文化主义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感受到了多元文化主义带来的威胁。^④一项针对2016年美国大选相关数据的分析结果也表明了本地白人对移民文化威胁的感

知。这项分析结果显示:有68%的白人工人阶级认为美国面临失去身份的危险;有62%的白人工人阶级认为移民威胁着美国的文化;过半数的白人工人阶级认为,对白人的歧视和对少数族裔的歧视一样成问题。^⑤再次,移民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促进了白人对自身种族优势地位的担忧。如前文所述,美国的白人担心在不久的将来自己会因为非欧洲移民的大量涌入而成为少数族裔,这也引发了白人对非欧洲移民的消极态度。这一观点在美国西北大学心理学家詹妮弗·里奇森等人的实证研究中可以得到证明。^⑥该研究表明,白人对人口结构变化的不满以及对自身种族优势地位的担忧,会激化其在种族问题上的消极态度。最后,右翼民粹主义力量进一步强化了白人身份政治对移民的排斥。右翼民粹主义力量站在白人工人阶级的立场强调白人身份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福利方面强化白人身份的政治逻辑。福利沙文主义(welfare chauvinism)^⑦是右翼民粹主义力量极具代表性的政治主张,它强调一国的福利仅限于特定群体(尤其是本地白人),而移民是无权享受的。所以本质上,福利沙文主义也是一个白人身份的问题。

① Emma Green, “It Was Cultural Anxiety that Drove White, Working – Class Voters to Trump”, <https://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17/05/white-working-class-trump-cultural-anxiety/525771/>.

② Maureen A. Craig and Jennifer A. Richeson, “On the Precipice of a ‘Majority Minority’ America”,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 25, No. 6, 2014, pp. 1189 – 1197.

③ William A. Galston, “On Immigration, The White Working Class is Fearful”,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fixgov/2016/06/24/on-immigration-the-white-working-class-is-fearful/>.

④ 威尔·金里卡《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衰?关于多样性社会中接纳和包容的新争论》,载于《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19年第3期。

⑤ Emma Green, “It Was Cultural Anxiety that Drove White, Working – Class Voters to Trump”, <https://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17/05/white-working-class-trump-cultural-anxiety/525771/>.

⑥ Maureen A. Craig and Jennifer A. Richeson, “On the Precipice of a ‘Majority Minority’ America”,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 25, No. 6, 2014, pp. 1189 – 1197.

⑦ Jørgen Goul Andersen and Tor Bjørklund, “Structural Changes and New Cleavages: the Progress Parties in Denmark and Norway”, in *Acta Sociologica*, Vol. 33, 1990, p. 212.

(三) 移民问题政治化与欧美主流政党的选举战略

从政党的政治诉求的角度来看,移民问题政治化,尤其是身份政治化趋势也是左右翼主流政党迎合特定选民群体和党内特别派系的政治诉求的一种表现,它与欧美主流政党政治定位的变化趋向是一致的。但移民问题的政治化同时也给这些政党带来了新的问题,因为它忽视了这些政党本身具有的多种社会基础以及它们之间在移民问题上相反的政治诉求,由此造成了政党选民联盟与党内派系围绕移民问题的新矛盾。这也为右翼民粹主义力量提供了可乘之机,后者通过突出反移民立场,赢得了部分白人工人阶级选民的支持,由此削弱了传统主流政党的选举优势。基于此,主流政党在近年来针对移民问题又制定了新的选举战略,以此来平衡政党选民联盟、党内各派在移民问题上的分歧,试图赢回被右翼民粹主义力量所吸收的白人工人阶级选票。

具体而言,中左翼政党在移民问题上的立场与政策主要是凸显新中产阶级选民、党内激进自由主义进步派以及与之结盟的科技行业在移民问题上的诉求。他们都秉持激进自由主义价值观念或是青睐移民的经济价值,所以倾向于支持移民。但中左翼政党宽容的移民政策却忽视了新中产阶级、党内进步派与白人工人阶级选民、党内劳工派在移民问题上的相左看法,后面两者更关注移民对本地工人的经济与文化造成的负面影响,支持限制性移民政策,甚至对某些移民进行有限驱逐。如今,中右翼政党严格的移民立场主要是吸收工人阶级选民和党内保守主义政治力量对移民问题的观点。但这种限制性移民政策势必会引起大资产阶级选民和党内建制派政治力量的反对,两者都从廉价的移民劳动力中获得了可观的利润,因而支持相对宽容的移民政策。例如,特朗普制定严格的移民政策使其获得了白人工人阶级选民的政治好感,但却遭到了科赫网络^①与美国商会的反对。美国商会在2016年出台报告以表明自己的亲移民立场。^②

在这种政治背景下,中左翼政党为了平衡不同选民联盟和党内派系在移民问题上的矛盾,往往会对选举战略进行调整,而调整后的选举战略往往体现了中左翼政党赢得白人工人阶级选票的

意图。近年来,中左翼政党主要有两种类型的选举战略。第一种类型的选举战略是突出阶级政治的同时支持强硬的移民立场,丹麦社民党和挪威工党都采取了这种战略。丹麦社民党在赫勒·托宁·施密特领导时期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并在移民问题上表现出宽容态度,这使该党损失了白人工人阶级的选票。^③在2019年的议会选举中,以梅特·弗雷泽里克森为首的社民党新领导层一反常态,有意疏离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转而强调经济不平等,并且吸收了丹麦人民党的反移民议程。这使社民党在工人阶级选民中重拾了往日的一些优势,也成为其胜选的关键要素。无独有偶,挪威工党领袖约纳斯·加尔·斯特勒在2021年议会选举中将经济不平等作为竞选的关键议题,他承诺对富人增税并且帮助穷人,这也为其胜选增加了筹码。由于新冠疫情降低了挪威的移民数量,所以移民问题在此次议会选举中并未引发过多关注,但由工党和中间党组成的新政府却推行了严格的移民政策。此外,社民党的反移民立场也引发了学界的争议。哥本哈根大学政治系教授彼得·内德加德认为“丹麦社民党严格的移民政策符合工人阶级选民的偏好,因此,社民党内部也不应该认为这有悖于政党意识形态。”^④但也有学者认为,丹麦社民党强硬的移民立场有违该党的政治理念。第二种类型的选举战略是中

① 科赫网络(Koch network)是科赫兄弟为右翼捐助者所举办的会议。参见 Matea Gold and James Hohmann, “Koch Network Condemns Trump Ban on Refugees and Immigrants”,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post-politics/wp/2017/01/29/koch-network-condemns-trump-ban-on-refugees-and-immigrants/>。

②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mmigration Myths and the Facts”, https://www.uschamber.com/assets/archived/images/documents/files/022851_mythsfacts_2016_report_final.pdf。

③ 自中左翼政党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以来,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白人工人阶级的物质利益受到损失,而其对身体政治的过分关注又导致该党忽视了传统的阶级政治并支持宽容的移民政策。上述因素共同导致该党的白人工人阶级选票外流。

④ Peter Nedergaard, “Out of the Liberal Policy Morass? How Denmark’s Social Democrats Might Reshape the Country’s Approach to Immigration”, <https://blogs.lse.ac.uk/europpblog/2019/03/25/out-of-the-liberal-policy-morass-how-denmarks-social-democrats-might-reshape-the-countrys-approach-to-immigration/>。

左翼政党在突出阶级政治的同时支持宽容的移民立场。拜登在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关注工人阶级的物质需求,他承诺要为低学历的人提供满意的工作。这一选举策略使民主党相比2016年大选赢得了更多白人工人阶级选民的支持。同时,拜登也勾勒出一幅具有人道主义色彩的移民蓝图,《华盛顿邮报》评论道“拜登的雄心是重建和扩大外国人合法进入美国的机会”^①。

在经济不平等与种族不平等日趋严重的情况下,中右翼政党往往通过强调移民所带来的文化威胁、人口结构变化的危机来赢得白人工人阶级选民和大资产阶级选民的支持。有研究指出,在经济不平等状况加剧的时候,中右翼政党通过反对移民文化的立场可以得到普通选民和大资产阶级的支持。这就是《推特治国》一书中指出的保守党的文化分歧战略,即亲商的中右翼政党很难让大资产阶级在物质上做出很大的让步,但是要想既不损伤大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又要赢得普通选民的支持,它就会强调带有种族色彩的非经济分歧,“甚至所有事项都带有强烈的身份认同和情绪因素,这就在‘我们’与‘他们’之间划下一道鸿沟”^②。马吉特·塔维茨等人的研究也表明,在移民大量涌入的国家,中右翼政党往往将种族、宗教、民族等问题政治化,以此来分散普通选民对经济利益的关注,从而在选举中赢得普通选民的支持。^③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中右翼政党在近年来的政治议程中突出阶级路线,但这并不是其赢得白人工人阶级选民支持的主要原因,日趋突出白人工人阶级的文化焦虑心态与移民危机才是根本原因所在。《大西洋月刊》中的一篇文章指出,特朗普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赢得白人工人阶级选民支持的主要原因,是其强调了白人工人阶级的文化焦虑心态以及支持驱逐非法移民的主张,经济困难的白人工人阶级选民更倾向于选择希拉里·克林顿。^④

四、结论

总而言之,移民是一个具有争议的问题,也是当今欧美国家政党无法回避的政治难题。后疫情时代,欧美国家还会迎来新一轮的移民和难民潮,尤其是2021年塔利班接管阿富汗以及2022年的俄乌冲突将会导致大量来自阿富汗与乌克兰的移

民与难民涌向欧美。同样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南部边境愈演愈烈的移民与难民危机也成为拜登就职以来的一场大考。自上任以来,拜登提供了数额巨大的赈款希望缓解危机,但抵达南部边境的移民人数依旧居高不下,特别是新冠疫情造成持续的经济低迷也导致越来越多的中美洲人民北上美国谋生。这也使美国南部边境涌现了大量的难民营,这里挤满了寻求庇护者,充斥着暴力、犯罪、毒品、卫生等问题。移民在抗议游行时手举“拜登解决问题”(BIDEN SOLUTION)、“我们需要政治庇护”等标语。但拜登政府显然没有做好安置大批难民的准备,共和党指责拜登处理不当,民主党内部也有声音批评拜登是在继续特朗普时期某些不人道的移民政策,而在白宫看来,防止难民北上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另外,由于主流政党难以就移民问题达成共识,导致移民政策朝令夕改。美国智库移民政策研究所(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称,特朗普在四年任期内对移民政策做出了400多项改变,前奥巴马政府国土安全部官员卢卡斯·古滕塔格(Lucas Guttentag)所领导的移民政策跟踪项目则认为这些发生了改变的移民政策接近1000项。^⑤移民立场及其政策的摇摆不定是欧美国家需要持续面对的艰难挑战。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宋阳旨]

- ① Paul Waldman, “Democrats Must Make a Much Clearer Case for Immigration”,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1/06/01/democrats-must-make-much-clearer-case-immigration/>.
- ② [美]雅各布·哈克·保罗·皮尔森《推特治国》当代世界出版社2020年版第24页。
- ③ Margit Tavits and Joshua D. Potter, “The Effect of Inequality and Social Identity on Party Strategies”, i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9, No. 3, 2015, pp. 744-758.
- ④ Emma Green, “It Was Cultural Anxiety that Drove White, Working-Class Voters to Trump”, <https://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17/05/white-working-class-trump-cultural-anxiety/525771/>.
- ⑤ Anita Kumar, “Biden Yet to Act on Overturning Some Trump Immigration Policies”,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1/03/09/biden-immigration-overhaul-474361>.